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二期 ——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10b)

---

【史林漫步】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	余汝信
【不堪回首】	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	胡志金
【史海钩沉】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始末	卜伟华
【读书笔记】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 ——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余汝信
【书评】	用照片还原出的林彪——读舒云《林彪画传》	何 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林漫步】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

• 余汝信 •

这部书（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第1版）能够在大陆境内公开出版，纯为一个异数。

这并非一部普普通通的那种回忆录。这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儿子，与功勋卓著而又有着独立人格的父亲的对话录。

父亲张爱萍，开国上将。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建国后主管解放军编制长达十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三十年，对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决策思维。

儿子张胜，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毅然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

张爱萍的独立人格，贯彻一生。

例一，晚年与张胜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想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页396—397。以下引文同出自该书，仅注页码不再出处）1989年，张爱萍就没有跟。（页420）

例二，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整个解放军都浸泡在商海之中时，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还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页466）

张胜的独特思想，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如对华国锋，张胜评曰：“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页407）

此一评价，颇为到位。

对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最有价值之处，是引用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揭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时期总参内部斗争的实情。

张胜称：“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页308）可惜的是，境内出版条件所限，张胜不能将迫害者直接点名，我们也就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谜。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张胜追问：“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页308）

经查，时张爱萍仍为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同为副书记的是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杨是代总长，李、王同为副总长。

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张扣押。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称：“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

（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页 3 0 8）

这“上面”，指的是什么人？

张胜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页 3 0 9）

谁的签名？张胜没有说。当时谁能代表党委签名？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只能推测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3月8日，揭批“反党分子张爱萍”的“追斗会”拉开帷幕。张在会上检查称“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页 3 0 9）

同日，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页 3 1 0）

3月9日，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页 3 1 0）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张胜说。（页 3 1 0）这个“他”，如无意外，指的还是杨成武。

同日，总参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页 3 1 0）

在总参，杨成武是一号首长。可简称之“首长”的，非他莫属。

3月10日，以总参党委名义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送到叶群处。其中写道“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原件未注明日期）（页 3 1 0）

张胜说：“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页 3 1 0）

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

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页 3 1 1）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页 3 1 9）这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谁？张胜仍然没有点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否就是总参领导人？我们不能肯定。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党委领导人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页 3 1 2）

我们已经指出，其实总参党委“领导人”即党委书记，就是杨成武。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页 3 1 2）

经核查，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是“这个领导人”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

12月18日，这个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页 3 1 2）

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称“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张胜语），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页 3 2 1—3 2 2）

“这位总部领导人”，毫无疑问，指的仍然还是杨成武。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自己倒台了。张胜说：“‘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

杨成武倒了，张爱萍的事还没有完。直至四年之后，1972年11月22日，方被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前此，在监护期间，使用的是“张绪”的化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重新恢复工作，被任命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四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这是后话。

关于文革中的“专案审查”，张胜在书中慨叹道：“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

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以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页328）

张胜想要知道的，我们同样想要知道。

惟张胜没有说出来且更重要的是，“上将”充其量只是一名打手，有关张爱萍问题的重要报告，均经毛泽东本人圈阅同意。

（2008年9月）

~~~~~

## 【不堪回首】

### 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

• 胡志金 •

重庆“八一五”公墓，这个文革遗址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这里埋葬了百多人的冤魂和尸体。墓园占地面积50余亩，每一块墓碑上都镌刻着“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其下都埋着一名、几名乃至十数名以上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 ◇ “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

跟全国一样，文革中重庆武斗分成两派：一派据称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始终不渝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所谓“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还有工人、干部成立的以“八一五”为代表的各种战斗团，后干脆一律对外宣称叫“八一五派”。

在重庆文革中进行到最激烈的1966年至1967年间，很快分离出另一派：“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联会”的“砸派”，俗称“反吊起”。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鸟鸣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八一五派”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据称还是请了风水先生的。首先，这里位于沙坪公园的僻静处，曾是解放前地下党常接头之处，有象征意义；第二，“反到底派”再强大不会攻到这里来，沙坪公园几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斗时期，以重庆大学为首的“八一五派”，占据了沙坪坝所有的地盘，该地区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重庆武斗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双方以“占山为王”的形式，来者先到就算是占领了所谓制高点。学校主要是各个教学大楼，工厂主要是职工宿舍和厂房。

占全国军工企业四分之一强的重庆，武斗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冲突烈度高，很大原因是这些大量的军工企业的存在，凡所有的常规武器，都有军工厂制造。打响山城第一枪的是在重庆工业学校，而真正发生激烈冲突的是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即现在的建设摩托生产基地。这是一个从汉阳迁至重庆的特大型军工企业。在那个时候这个厂是极端保密的，守卫这个军工企业的是一个连的解放军部队。

#### ◇ 动用军工武器的流血武斗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设机床厂厂区劳动一村的人们，发现对面民主村屹立在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突然被“反到底派”围攻。早上8点左右，“反到底派”来了很多人，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红砖楼进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砖楼投掷燃烧瓶。红砖楼于夜间被“八一五派”占领，这是建设厂“反到底派”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夺回来。

数百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轮番进攻，不断地向红砖楼投掷汽油弹。于是双方展开攻防拉锯战，伤亡惨重。

“反到底派”攻到上午10点左右，于深夜将两幢红砖楼居民赶走并占领红砖楼的空压厂“八一兵团”，开始吃不住了，其中一幢楼开始起火。“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跟“八一五派”的人一样，大都是中学生和工人，建设厂以青年工人为主的“反到底派”组织——“红大刀”，驰名中外，其成员大都是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的棒小伙，在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他们找来梯子往红楼上攀登，跟电影上看到的场景一样。

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派”看见建设厂方向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是工人组织，空压厂是制造两栖坦克的工厂，这些造坦克的工人从空压厂自己命名的所谓“八一大楼”内冲出来，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杀声，狂叫着朝建设厂家属区的民主村红砖楼冲将而来。

这时，建设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林仲的建设厂工人，有人对冲过来的“八一兵团”的武斗人员悄悄说，这个人是“反到底”的。说时迟那时快，3个人冲过来用钢钎捅王林仲的腰杆，王用手去遮挡，手当即被刺穿，血流遍地。这些人又赶着去解救红砖楼的战友去了。

“反到底派”迅速撤退，兵败如山倒。

上午11时左右，一个“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看见一个“反到底派”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这时在山下围观的建设厂职工家属都发出惊骇声，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反到底派”的那个红卫兵硬是扔了钢钎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的人如同投掷标枪一样，奋力将手中的钢钎朝那个“反到底”掷去！

幸而没有命中，这个“反到底派”红卫兵逃过一劫，返回大本营后发誓要报仇雪恨。此人姓于，是重庆三十五中的学生，体型强健，非常热爱体育运动，1965年春学校选飞几乎进入空军飞行员行列，因学习成绩差些未能如愿。这人后来死在攻打潘家坪重庆雾都宾馆的武斗中。

中午12点左右，重庆三十五中高中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撤到其中一幢红砖楼的背后，恰好被包抄过来的空压厂“八一兵团”截住。住在建设厂劳动村的数千人都在山崖下看见，此

时两个身穿藏青色工作服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用钢钎狠刺已经倒地的红卫兵。两条钢钎扯出来再刺进去，扯出来再刺进去。事后发现，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

战斗结束，双方撤离，这算是一次战役，以“反到底派”的暂时失败告终。宋正言被“反到底派”的人用凉椅抬下来，身上护体的一层薄钢板被刺穿，藏青色工服被鲜血浸透。宋正言被刺透25刀，于当日午后1点左右死去。这时，占领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这条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1967年7月29日，传来重庆工业校发生了枪击事件，这算是打响了山城第一枪。武斗立即开始升级，很快发展到动枪动炮，机枪、坦克、军舰不在话下。

建设厂是军工企业，主要以生产枪炮为主。枪战发生后极大地刺激了“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建设兵团”，立即发枪！没多久，重庆各地的“反到底派”前来筑巢，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斗双方都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激愤地要消灭对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7月30日，“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反到底派”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数百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拉开了枪机，一箱箱的子弹用刺刀撬开，分发下去。

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八一兵团”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建设厂生产的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八一五派”占据的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八一五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下，被打死的腐烂在水田里的还不在其中，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埋在沙坪公园的“八一五”公墓里。

8月5日，“八一五派”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而“八一五派”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学生，手持各种火药枪、“汉阳造”，朝清水池高地冲锋，均被“反到底派”各种轻重武器打死，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8月的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150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却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 ◇ 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武斗结束，双方在“九五命令”下缴枪，但都没有履行。

1968年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这一次“八一五派”吸取了1967年的教训，首先步步为营，占领了“反到底派”的据点，在“反到底派”的边缘地带修筑工事，迫使其后退，

到武斗打起来时，“反到底派”已无还手之力。

1968年7月30日，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一个特大型军工企业里，发生了文革中重庆一次激烈的武斗。其场地主要集中在4幢职工宿舍，有两幢被“八一五派”占领，“反到底派”据守在另两幢单人宿舍里，其中一幢被称为的“三八宿舍”。

双方都在黑夜到来时，从窗台上伸出半自动步枪朝对方开冷枪。

重庆建设厂中“八一五派”一个红卫兵当即被击中脑袋，脑浆迸裂。

此人就埋葬在“八一五”公墓。姓刘，年约17岁，后被“八一五派”追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英勇战士”。事实上，那时候谁也保卫不了谁。小刘的父亲，一个从湖北汉阳到重庆的老工人操着浓重的汉阳腔说：“个巴马，有X用！”刘老汉活至1999年6月，无疾而终，享年95岁。

此时，重庆武斗还在其他地方进行，但规模要小一些。

战斗进行到次日凌晨，“反到底派”的火力完全被“八一五派”压制，陆续从几幢楼房撤出，这些人携带大量轻重武器撤退。枪炮声一直持续至天亮，成渝铁路沿线大批的“反到底派”成员携家带口前往重庆火车南站集中。在这里，一个“反到底派”红卫兵手提一支20响盒子炮在现场指挥，火车头上架起两挺重机枪。火车行驶到重庆大渡口火车站，被部队拦下，双方发生小规模流血冲突。“反到底派”在此四散而去，大都拦下火车去了成都，直至9月重庆警备司令再次发出双方上缴一切武器的命令。

“反到底派”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员大多就地掩埋。

重庆体育馆曾经也是“反到底派”的据点之一，在那里被打死的中学生红卫兵十数人均就地掩埋。文革结束后，他们的亲属陆续将这些人的尸骨迁走。首都北航“红旗”和一些外地来渝被打死的“反到底派”的红卫兵，同样就地掩埋，文革后期由亲属取走。

1967年以建设厂为中心被打死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大多埋在建设厂老医院前面的一片树林里，当时还有一块块木牌，上写着死者姓名。

重庆三十五中初三年级于某，即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兵团”追杀的那个“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在其后不久的8月19日，进攻潘家坪五台山重庆雾都宾馆的夜晚，即被乱刀捅死，就埋藏在此。

于某身高1.75米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腰插一支手枪，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班12个人的干粮，于当日一个人独自摸索上五台山，因口令不对被是“八一五派”活捉，最后被刀捅死后，扔下山崖。紧跟着，“反到底派”连夜用数台14.5毫米4条枪管的高射机枪轮番攻击，占领宾馆后发现于某血已硬凝，抬下山来，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给他穿上抢来的军装，手握两颗子弹，十数人鸣枪为于某送行。

“反到底派”占领五台山雾都宾馆后的一个中午，一个“八一五派”“机校兵团”的人身穿工作服，携56式冲锋枪一个人闯了进来，看见“反到底派”的人员正在吃饭，刚要转身，被其校友发现。只听见一阵乱枪扫射，此人当即倒在血泊中，胸如蜂窝，血喷涌而出。



这个姓雷的“八一五派”红卫兵，年仅19岁，后埋葬在“八一五”公墓，石碑上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高耸的墓碑正面写有“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 ◇ 往事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公墓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网络上不断有人进行报道和披露，使原本这个不起眼的“文革墓地”成了众所周知的存在，成了那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回忆，而“暴毙”成了当今年青人的谶语。

“在激情中暴毙的红卫兵！”这样的用语是有争议的。那些牺牲了的曾经梦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和未来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年青人，长眠在了重庆这块炽热的大地上，让后人以各种复杂的眼光去评说。他们的死是无谓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却给了今天的青年以思考，尽管出现了“暴毙”一说。

今天，这个公墓早已是绿草遍地，半人深的茅草遮蔽坟墓的荒凉景象已不存在。后人修剪芜杂的荒草，春天来了又开起了鲜花，鸟儿在坟墓上空的塔林上停留，一片生机。近来，有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人的墓地。

这里的坟墓大都用当时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如今大多风化，有的甚至上面的字都已剥落，凋零不堪。墓碑上刻有死者姓名和当时流行的壮语，多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重庆武斗的发源地建设厂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在“八一五”公墓里掩埋的有30多人。这个墓很宽大，上面有一支火炬，碑文多写此墓安葬的人的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的，其“英雄气概永不灭”等等。

2007年夏，沙坪公园游人如织，其中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特地赶来，目的就是一睹“八一五”公墓，甚至有人提出将此作为中国文革的见证，对外开放，收取一定入场费。此建议当即受到质疑。

墓地墙外右边用红色的油漆写着4个大字：文革墓群。

文革过去40多年了，然而这个梦魇还在缠绕着一些人。

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刺伤的王师傅，至今还躺在床上，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刀光剑影的派性厮杀中。有朋友去看他，拉着他被钢钎刺穿伤残了的手，王师傅会情不自禁地问道：“‘反到底’打回来了么？”如果，您说早打回来了，年近八旬的王师傅马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往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大大地叫一声：“拿酒来，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他还能从1967年坚持到现在，也就是4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全凭的就是“反到底”打回来的信念。王师傅的神志是清醒的，妻子问他：“你知道你的退休工资涨了好多？”王师傅先伸出一个指头，然后再伸出3个指头：“137块7！”

而在1967年7月25日争夺建设厂红砖楼的厮杀中，用钢钎刺死重庆三十五中学生宋正言的一名“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武斗成员，因长时间被血腥的梦境所困扰，情志不悦，很多年一直内疚不已，于2002年3月18日患肝硬化而亡。

“八一五”公墓埋葬的只是文革中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

□ 《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

~~~~~  
【史海钩沉】

##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始末

• 卜伟华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2〕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 一、背景

1967年4月23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4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4月26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声讨印尼政府的反华行径。从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学校师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连续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累计人数超过60万人。

5月6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15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

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有3点：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英国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中国外交部于22日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其人员于48小时内离开上海。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5月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无异于是号召采取行动解放香港。在这一天，香港有500人被捕。（3）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据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4）。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到7月3日为止，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的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故宫午门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据后来揭发的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策划的。戚本禹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

7月15日起，外事系统造反派开始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开展“揪陈（毅）”活动。当时，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余所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成为在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组织。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70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的外宾接待室，打骂前来劝阻的工做人员，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向他们提出抗议，由于

造反派的捣乱，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瘫痪。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扬言：“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掀起了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浪潮。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8月19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8月20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他们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 二、经过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5〕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

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锥、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太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 三、善后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7）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

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已觉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后有坏人在操纵群众运动，在他们最猖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地进行反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说完，将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26日，毛泽东即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8）

8月31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他对姚登山说：“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在对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关锋这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竣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9）

注释：

（1）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于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3〕 参见连生等编著《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下，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页。

〔4〕 这次和缅甸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是由中国外交官挑起的。见《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5〕 “48小时通牒”照会事先经周恩来签发。当时在外交部掌权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来极度疲惫、已上床就寝之际，以特急件让他签批。事后，周恩来常自负疚，引为教训，并无一字推诿。

〔6〕〔美〕威廉·韩丁：《百日战争》（英文版《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

~~~~~

## 【读书笔记】

###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 ——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 余汝信 •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这是近两年来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高饶事件”，是至今未有得到公正评价、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首要大事。本书在披露这一被重重帷幕遮盖着的事件内情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保证了本书立场的客观性。

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浓缩概括后的事件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了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页III—IV）

##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泽东“之后”怎么办？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页105）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页107）

“这期间，毛泽东十分器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页107—108）

###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象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1935—1953年，从陕北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象老人家重用他’。”（页108—109）

作者认为：“毛泽东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页109）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页110—111）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页111）

###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页111—112）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页114）

“高岗把查敌档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页114）

## 五、陈云的角色：鼓励与建议

毛泽东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页114）

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页115）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页115—116）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岗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了。

##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页118）

作者接下来说：“‘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页118）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

作者称：“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页120）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页121）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心甘情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戴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页122）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据说，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页258）

毛泽东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页251）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页252）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页252）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页252）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页252）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页252）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页254）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页255）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页256）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作者说：“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页256）

##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了“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作者称：“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少奇）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页257）

作者以上所说大抵都没有错，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的，不

是什么“造反派们”，而是毛泽东所操控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

(2008年9月)

~~~~~

## 【书 评】

### 用照片还原出的林彪——读舒云《林彪画传》

· 何 蜀 ·

我所知道的画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绘画形式讲述人物传记，如20世纪40年代由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段绳武编)和《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另一种是以照片等画面内容配以文字介绍人物生平，如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这本《林彪画传》。这两种画传的编写，各有各的难处，前一种，要完全用绘画来表现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对于严肃的作者来说，并非易事；后一种，则主要难在照片的搜集上。

当代中国的重要人物，由于国情的局限，不像民主国家的公众人物那样时时处于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影像资料完全向民众公开。中国的名人特别是政要的照片，大多被视为“国家机密”，不得随意公布，要发表必须经过研究、审查、批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有时还必须做出一些所谓“技术处理”(其实就是“造假”的另一种说法)。甚至哪一级领导人的照片能够上报纸的头版或杂志的封面，什么时候可以上，版面大小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服从“宣传纪律”的严格规定。而一旦某政要从“革命动力”变成了“革命对象”，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那么他的照片立即会遭到封禁、销毁。保存其照片也往往会被视为“划不清界限”或“别有用心”的罪过。因此，要用照片这种形式来编写当代政要的画传，往往就比用绘画形式难得多。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当局为隐瞒和篡改历史，消除民众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居然“叛逃”所引起的对“明察秋毫”、“战无不胜”的最高统帅的质疑，倾全力对林彪进行妖魔化的大批判，连几岁的小孩也只知称“林贼”、“林秃子”而不再称“副统帅”、“林副主席”。在那样的形势下，谁还敢保存林彪的照片或画面中有林彪形象的照片，简直就等于引火烧身。因此人们(上至高级干部下至平民百姓)纷纷销毁家中所有的林彪照片或画像，有的实在不好或不敢销毁(如有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或舍不得销毁的，就将其中林彪部分剪掉，或在林彪脸上画一大黑×以示对其憎恨的“革命立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编写这样一部《林彪画传》，实在是困难万分。但舒云居然完全凭借个人而非组织的力量就把事情做起来，而且做成了，不能不令人感到佩服和惊叹。

翻开这部画传，看到那么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真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其中不少照片是以前见到过而且十分熟悉的，但是一旦将这样多的照片集中到一起，组合成阵，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产生一种新的感受，一种不同于以前分别或单独观看其中某些照片时的感觉。面对这些历史画面，当年大批判中的妖魔化宣传，有许多就成了不攻自破的无稽之谈了。

因此，舒云能想到这样一个点子，搜集到这样一些历史照片，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舒云为画传所写的文字部分，也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对照片的简单说明，而是有助于深入了解相关历史情况的丰富的调查材料和研究心得。其中不少内容从历史的真实

出发，大胆突破了以往多年大批判宣传中早已众口铄金、形成积毁销骨之势的老调子（特别是第十章以后的章节，比如“‘倒罗’是毛‘文革’部署的第一步”、“林彪事先不知道上海会议的内容”、“打倒贺龙、刘少奇，与林彪无关”、“林彪和周恩来站在一条战线上”等小节中的内容），正如王年一在给本书所写序中所说的，这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这个“还原”，我认为不仅仅是从“九一三”之后批判和审判林彪时的妖魔化宣传中还原，而且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由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遵照毛泽东旨意所积极参与的“大树特树”林彪的宣传中还原。比如，众所周知，在文革初期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向全国宣布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时，说林彪“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1966年10月5日叶剑英在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叶剑英的这个宣布，当年曾被狂热的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全国各地到处传抄、张贴、广播，可谓家喻户晓。而画传则以《病魔缠身》这整整一章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了还原。

经过长期从事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写作的锻炼，舒云的文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使人想到她那快人快语的性格），可读性很强，这也给本书增色不少。同时，舒云也注意了与一般只强调可读性而擅加虚构编造的纪实文学拉开距离，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对许多重要史实和引用材料都注明了出处（其中有不少是她的独家采访所得）。这些又从历史科学的严谨方面为本书增加了分量。略嫌不足的是，其中有些地方引用或转述的文字与作者的叙述文字在语气上有些混淆。

许多历史的真相被屏蔽已久，歪曲已久，要还原真相是非常艰难的浩大工程。近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一工程中。舒云的《林彪画传》就为这一工程添上了一块砖。

□ 原载《多维月刊》2008年9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